

21 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

2002
文学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文学评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
(21 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
ISBN 7-02-004253-8

I. 2… II. 南…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952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2002 文学评论

2002 Wen Xue Ping Lu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4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253-8/B·278

定价 26.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开始编选年度短篇小说选和年度中篇小说选，颇受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后来，又增加了散文年选等种类。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每一年度文学活动的整体状况，我们又将年度文学评论选列入出版计划。

就像生产需要消费一样，文学创作也需要文学阅读，更需要成熟和深刻意义上的阅读——文学批评。就像不存在无消费的生产一样，离开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文学活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文学生产就丧失了彼此依存的对象主体和内在驱动力。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达成人与人精神交流的理想情境。优秀的作品，让作家和批评家共享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欣悦，而失败之作，则需要批评家直言无隐地揭示缺失、指出问题，共同体验写作的艰辛和相推相激克服困难的快乐。而无论面对哪种情况，我们需要的，都是心怀善念但绝不宽假、充满活力但绝不任性的健康、成熟的批评。通过检视、编选每一年的文学批评，推动批评趋向成熟和完善，从而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正是我们不惮烦苦编选文学评论年选的目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这件事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 年 6 月 4 日

目 次

出版说明 (1)

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 许志英(1)

欲望: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

——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 陈思和(10)

论中国当代戏剧中的反现代倾向 董 健(33)

瓶颈中的王安忆

——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 吴 俊(43)

“池莉热”反思 刘川鄂(56)

行走的斜线

——论 90 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

不平衡现象 陈美兰(67)

文学写作的诸问题

——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李建军(79)

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谢 泳(99)

重建中国的叙事

——《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 程光炜(112)

文学出版与 90 年代小说 黄发有(128)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陈 虹(145)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 何 蜀(159)

逼近历史的真相

——关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 卢 翎(170)

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况

——读《沧浪之水》…………… 邢小利(176)

超越与局限

——论 80 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 王兆胜(185)

现代美文的杰出实践

——论白先勇的散文创作…………… 刘俊(198)

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

——对当今文学存在理由的若干思索…………… 雷达(212)

迷失于没有希望的小屏幕…………… 雷池月(222)

古装戏:大众情绪的症候式表演…………… 王际兵(230)

这就是妇女解放?…………… 牧惠(236)

“两个翅膀论”献疑

——致范伯群先生的公开信…………… 袁良骏(246)

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鲁迅对流氓性与流氓意识的批判…………… 王骏骥(254)

论《野草》的视觉艺术及其渊源…………… 江弱水(266)

人何以“立”…………… 蒋泥(281)

悲情·人格·思考

——《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吴小龙(296)

传统叙事模式对现代意识的牵绊

——看《传奇》中似乎写“坏”了的奇…………… 罗艳(310)

“路”:开启卞之琳诗歌迷宫的一枚钥匙…………… 张文刚(319)

词典体小说形式分析…………… 赵宪章(328)

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 周宪(356)

丰饶的碎片…………… 洪治纲(372)

学音乐的孩子会怎样	
——音乐本质再思考	邓双林(380)
道德中介论	何西来(396)
“故事与俗语”解构之“解构”	申 丹(414)
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	罗 钢 孟登迎(433)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	王 诺(444)
想像、幻象与消费社会	温 恕(459)
语言的宿命	毕飞宇 汪 政(467)
行为艺术的道德底线	王晓华(492)
编后记	(495)

【许志英】

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

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分期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全国性学术会议至少举行过两次。一次是1986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讨论会”;一次是2001年11月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在沪召开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两次学术盛会。

在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之前,我要简要说一说我的关于中国文学分期的总的想法。我认为,将中国从古到今的文学以1917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古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文学时期——是适宜的^①。关于“近代文学”,我同意章培恒先生的看法。他说:“就中国文学史来看,从1840年至1919(或1917)年能否作为自成起讫的历史时期——‘近代文学时期’——本就是一个问题”^②。从文章看,章先生是不同意“近代文学”这个说法的。但如果取消“近代文学”的提法,其归属就成了问题。而这问题要从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异同关系上才能说清楚。如果“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同大于异、与现代文学相比异大于同,即归属于古代文学;反之则归属于现代文学。这样的一个标准,我想不应当有太大的异议。

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代”、“现代”概念,从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还包含着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的性质的认定。什

么是现代文学？唐弢先生在给严家炎先生《求实集》所作的序中曾有一个简单的界定：“现代文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换用王瑶先生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话来说，其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③。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以为近代文学实难以归入现代文学的范畴。就文学观念来说，古代文学虽异彩纷呈，总体上却未能跳出“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框范。近代文学虽然有变，也未能跳出这个框范，梁启超经常被人征引的建立在“新民说”基础上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还始终服务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要求。而五四文学革命时举起了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人的文学”^④的大旗，断然与“代圣贤立言”的观念彻底决裂，而改为自己立言。这种“人的文学”观念与李达钊所持的“社会写实”的文学观、鲁迅及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观、创造社为代表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等等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文学观念上的质的飞跃。就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和文学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来说，“近代文学”中虽然有了一些现代意识的萌芽和基于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之上的思想情感的表达，但这种现代意识和思想情感还远没有达到同传统思想抗衡的深度和广度，梁启超对自由的理解还停留于“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⑤，自由的保障成了自由的目的。个人一语，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的说法，虽然早在20世纪初即已引入中国，鲁迅也早在1908年前后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但个人主义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鲁迅有些独异的思想真正获得广泛的反映和回响还是在1915年以后，而落实到创作中则还有待《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出现。文学语言的变化是中国文学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最直观和最鲜明的标志。白话文取代言文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地位的正宗文学语言不仅只是一种表达工具的变化，它还蕴含着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并引发了除文学

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学形态(如文学样式与体裁、创作方法与艺术手法等)的变革。在白话取代文言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也实现了“文体大解放”,在文体上与世界文学接轨,小说等边缘文体取代了诗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体。而在“近代文学”时期,裘廷梁、王照等人的提倡白话,一方面只是将白话作为“开发民智”的一种工具(如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另一方面也没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大的普遍性的影响,不仅一度流行的同光体的宋诗和桐城派的散文是用的传统的文言,而且黄遵宪的新体诗、梁启超的新民体散文也未能幸免。诚然,“近代”确实出现了采用白话的谴责小说,但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后来却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了;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思想感情,秋瑾用白话所写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确实不失其“新鲜味”,但它在当时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能称得上纯粹的文学作品还很难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型期,“近代”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所采用的语言虽是文言,其创作精神和思想情感却有较多的“现代性”;鸳蝴派里的白话小说,语言虽是白话,艺术描写和思想情感反倒有较多的陈腐气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样往前去清理白话文学的发展路线,或是像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样去追究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但在给中国文学史进行分期时,大可不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挪移。迄今为止,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还是近代文学的范围应该是由鸦片战争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观点,抑或是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于1894年、1897年或1902年、1905年等等的主张,都看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应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无形中也就不忽略或者说抹煞了“五四”文学革命之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也许,重提张定璜评价《狂人日记》时的话是必要的:“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桺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

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⑥从他的话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总是要从《狂人日记》一类作品讲起的原因了。我们并不因为现代还存在着旧体诗词的创作便动摇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样也不能因为“近代”存在着白话文的写作和现代意识的萌芽便将“近代文学”归入现代文学。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同大于异、与现代文学相比则是异大于同,因而将近代文学归属于古代文学比归属于现代文学要妥帖得多。

如果上述看法能够成立的话,在文学史分期上就只剩下“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了。这两个概念如何整合呢?

“现代文学”是解放初就有的概念,当时“现代文学”、“新文学”混用,如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而丁易则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命名。到了1961年唐弢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组织教材班子时则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后来“现代文学”的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当代文学”的概念,解放初期还没有人提,直到1958年大学生大编教材时,于1959年科学出版社推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才出现“当代文学”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逐渐推广开来。到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各高校作为两门课程开设,不少学校设立了两个教研室。记得80年代中后期国务院整理研究生专业目录时,我听叶子铭先生说,起初大家同意用“中国现代文学”来代替“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等到目录正式公诸于世时,还是叫“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因据说是搞当代文学的一批人不同意取消“当代文学”概念,说当代文学时间比现代文学还长,为什么要取消当代文学的提法,这不是现代文学吃掉当代文学

了吗？现在看来，这种跑马圈地、各立山头的思路已没有多少市场，人们对从1917年起始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文学只能作为一个学科，已无多少歧异之见，因为从学科内涵来说的确没有将两者分开的理由。历来的文学史分期，人们都遵守“远长近短”原则，但即使“近”可以“短”，一共八十余年的文学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文学形态来看都找不出分开的理由。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给它命名。不用原先的提法也未尝不可，但是用什么呢？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让大家认同的看法。那就用原来的概念，那么用“当代文学”行不行？可“当代”总含有“当前”、“当下”的意思，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为“当代文学”，是可以的，如果说50—80年代的文学是“当代文学”就不怎么妥帖了。唐弢先生1985年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时一开篇就说：“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⑦乍看有些突兀，其实是唐先生所理解的“当代文学”即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历史需要稳定，当前的文学只有经过时间的淘洗才能沉淀为历史。如果先入为主地认定“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当代文学宜不宜写史的问题永远也得不到解决。而面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我们也只能开出一些类似于“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来加以补救。看来，“当代文学”的概念确实成了一个问题。谢冕教授就曾说：“被称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文学研究学科，从它的历史跨度来看，已达半个世纪，而且眼看就要超过半个世纪，可它仍是‘当代’。这从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但这问题的解决，却非个人所能为，需要整个学术界达于共识的努力。”^⑧

既然以往约定俗成的“当代文学”成了问题，那么将它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怎样？我想是可以的。我在将中国文学分作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时，现代文学就是一个可作延伸的概念，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作现代文学。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文学

观念到文学形态没有出现像 1917 年那样与前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文学史分期的“界碑”，现代文学就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仍可以保留“当代文学”的提法，用它来指近十年的文学。譬如目前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叫当代文学。谈蓓芳教授在《复旦学报》2001 年第 1 期发表的《再论中国当代文学分期》文章，将 1992 年以后的文学称作“当代文学”是颇有见地的。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始终指近十年的文学。如再过十年，我们又可以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划入现代文学时期，当代文学则指 21 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在前不久由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会议上，王富仁教授在发言中说，文学研究不能一年同一年相比，那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要十年跟十年相比，才能看出发展变化。他的看法是有启示意义的。这种处理方法，既立足于现有的文学现实，又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在大体明确文学研究的边界与范围：原来归属当代文学而被纳入现代文学的部分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用来指称当前文学（近十年文学）的“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象。

为何要将“当代文学”的“当代”明确为“近十年”？一是经过大致十年的淘洗，前十年的文学已得到沉淀，可以进入到史的描述和研究范围；二是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是保持了十年一变的发展速率，这一方面为带有权宜性质、始终变化着的现代文学与当前文学间的切分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这种变化也为前一阶段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带有“他者”性质的参照系，借助于这一参照系，前一阶段文学的意义与局限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就是如此。说起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人们都说有惊人变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 90 年代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日新月异是自然的事。概括起

来说,90年代文学至少有这几点变化:

一、就文学与政治关系来说,进一步处于淡化的过程中,文学不再紧紧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惟政治之命是从了。这在过去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事。记得在1958年,竟要求文学服从于当前的政策,提出过“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的口号。现在文学的自由度大多了,“五四”人所日夜期盼的“创作自由”现在已初步实现,“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⑨。

二、几代人不停地呼唤甚至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文学“多元化”、“多样化”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多样化”不去说它,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早就有人认为是“芜杂”了。我想“芜杂”是“芜杂”,但空前的“芜杂”与空前的繁荣是辩证的统一。没有了空前的“芜杂”也就没有了空前的繁荣。我们经历过不“芜杂”的时代,那时候,八亿人八个样板戏,这正常吗?难道我们愿意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吗?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多样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中人生形态的多姿多彩,同时根植于作者队伍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信守的作家群落,各展其长,各显神通,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局面。

三、性爱描写的大拓展。我们经历过在文学中封杀爱情描写的时代,那时候一写到爱情就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爱情成为文学描写的禁区。其实谁都知道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爱情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王安忆曾说:“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⑩爱情描写在新时期文学中是逐步放开的,到了1987年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可说进入一个新阶段。岗上的世纪关于性交的描写如此动情美丽,并不给人污秽的感觉;到了1993年贾

平凹《废都》中的性交描写就不那么让人无话可说,已有点“少儿不宜”了。此后性爱描写像决了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有些女作家竟将兴趣落在写女性手淫的过程与感觉上,这无论在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中都极为罕见。在这些作品中性爱描写已经走火入魔了,到了“有碍健康”、“折辱尊严”的地步。我郑重地说一句:此风不可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我们封杀爱情描写,一旦放开,会有一些出格现象出现,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情况会有所好转。

借助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新变化,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的一些文学创作现象可以得到更准确的定位与评价。当然,放到历史的中时段和长时段中去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新变化,仍然属于历史的短时段里的变化,仍然属于“以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文学,将来依然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

中国文学以1917年为界分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而当代文学则是指近十年的文学,这就是我给“当代文学”的一个说法。

① 这一点我在《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②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复旦学报》2001年2期。

③ 《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④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⑤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⑥ 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第7、8期。

⑦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⑧ 谢冕:《郑万鹏〈中国当代文学史〉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⑨ 伏园：《〈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2期。

⑩ 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性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选自《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陈思和】

欲望：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

——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

一 为什么要用恶魔性因素来解读张炜的小说

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是来源于一篇论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论文^①，从德国文学以致欧洲文学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恶魔性因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没有可能反映出世界性的因素^②，能否体现出中国作家在全球性格局下达到与外国作家的同步性思考，以及何以显现世界性因素的本土环境特点，都是我所关注的领域。为此我曾尝试将恶魔性因素移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首先是讨论“文革”题材书写中的恶魔性因素^③，进而要讨论的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恶魔性因素的特征及其相关问题。

近几年张炜连续创作长篇小说《外省书》和《能不忆蜀葵》，引起的争论非常激烈，我发现这些争论与它所批评的对象中，隐含了批评者对某些张炜的传统风格所不能涵盖的新的因素的陌生感与焦虑感，那包括了作家超越现实的政治层面和自然的民间层面、直接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状况而发出的心声，以及作家个人所特有的思想探索与人格冒险。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的怪诞显现，其遭到误解以至引起争论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仍然以为这两部作品对张炜来说是重要的，它们不是张炜向新的创作高峰过